

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 1995—2003

王天夫 赖扬恩 李博柏

提要: 本文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性别社会分层的新的理论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原来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歧视也将逐渐加重。本文使用了跨度15年的3个全国性数据来验证这一理论推导出来的一系列假设。

关键词: 社会分层 性别收入差异 再分配

一、引言

尽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使得男女两性平等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教育水平以及职业地位的获得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男女性别间的工资依然有着相当的差异。这一性别收入差异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依然明显(Bian et al., 2000; Parish & Busse, 2000; 张丹丹, 2004; 谢嗣胜、姚先国, 2005; 李实、马欣欣, 2006)。面对这一现实,众多的理论解释简单地将它归结于性别歧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并没有完全消亡。这样的结论不仅仅与社会主义制度所极力倡导的平等主义理想相矛盾,同时也无法解释不同社会群体的女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的实际情况(具体评论综述见Bian, 2002; Xie & Hannum, 1996)。^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讨论又给出了较为混乱的结果:既有认为性别收入差异持续的,也有认为收入差异将扩大的,还有认为收入差异将缩小的。这些困境和矛盾都要求理论脉络更清晰,同时也更具概括性的理论建构。

^① 最为有意义的例子是谢宇等指出的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与同等教育水平男性间的收入差异是不同的(Xie & Hamum, 1996)。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不可缺少的一步就是重新理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分层的结构和产生的机制,并进一步评估这样的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趋势。

社会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理论有萨列尼为代表提出的再分配理论(Szelényi, 1978),以及倪志伟扩展再分配理论而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 1991)。萨列尼进一步阐述了波兰尼的“再分配”概念(波兰尼, 2007/2001/1944),并延续了早期的“新阶级”理论传统(Djilas, 1957),明确地把再分配者称为“组织在垄断再分配权力周围的阶级”,并将之与“工人阶级”相对(Szelényi, 1978: 77)。通过对再分配过程的控制,再分配者剥削直接生产者,并让自身阶层得利。这一理论逻辑控制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研究,其表现就是由其发展而来的市场转型理论及围绕其间的争论(Nee, 1989, 1991; Bian & Logan, 1996; Xie & Hannum, 1996; Walder et al., 2000; Zhou, 2000; 宋时歌, 2004)。尽管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有着较大的理论意义,但它仅仅构成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平等的一个小部分(参见 Walder, 1996)。将波兰尼“再分配”的概念简单延伸为一个从精英角度出发的解释体系,以及对精英阶层的过分关注,阻碍了我们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分层结构的理解。

回到性别收入差异的话题,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包括,为什么在强烈的社会主义平等政策下,会产生区隔男女两个劳动群体的鸿沟?生成这一性别差异的,是与区隔精英和普通大众的相同的再分配过程,还是其他还没有指出的机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分配相比,再分配过程是怎样影响性别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显然,对于“再分配”的有限理解以及对于精英特权的过度纠缠,使得我们无法回答以上的基础性问题。尽管有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我们仍然缺乏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分层过程的综合理解(伦斯基, 2005/2001)。性别界线已经超越了再分配者与生产者群体的二元划分,再分配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女性都同样受到性别歧视。

在本文中,我们用当代中国城市性别收入差异来演示社会主义分层结构的特征。我们希望说明:(1)产生性别收入差异的性别歧视的部分根源存在于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之中;(2)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扭曲了社会主义的再分配过程,生成了一个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不同等级地位群体的女性在再分配过程中的位置相关,她们面临着不同

程度的性别歧视; (3) 随着社会转型及再分配过程的改变, 性别不平等的结构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别不平等

(一) 研究对象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 有必要说明, 我们无意争论社会主义国家中有(或是无)性别歧视。目前有关研究似已达成共识: 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诺言在现实中没有达成(Stacey, 1983; Einhorn, 1993; Sørensen & Trappe, 1995; Honig, 2000; Parish & Busse, 2000)。即使有着相似的个人资源, 这些社会中女性的收入仍然少于男性。因此, 性别歧视显而易见。但是,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深入探求这样的收入差异背后的分层结构。我们认为, 由于再分配过程及其中的官僚政治, 不同群体的女性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歧视。本文的目的是描绘不同阶层女性所面临的与本阶层男性之间的收入差异。

(二)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差异

社会主义性别平等的思想产生于对女性局限于家庭事务的批判。正是由于女性肩负了繁重的家务责任, 才导致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 最初的解决方案是推广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并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措施逐渐变成了一种官方语言, 并可以用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来总结。因为这些政策, 中国女性获得了接近于男性的教育水平和工作比例(Tang & Parish, 2000; Parish & Busse, 2000)。例如, 中国的女性工作比例为世界最高的90%(UNDP, 2002)。

但是, 高比例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主义所承诺的性别平等。相反, 女性通常发现自己陷于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Whyte & Parish, 1984; Parish & Farrer, 2000)。尽管中国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是名列前茅, 但总体上她们的收入还是要低约25%(Putnam, 1990; Parish & Busse, 2000; Bian et al., 2000)。即使控制了其他因素, 女性的收入还是比男性少。特别是具有同等教育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工作经验的女性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社会主义社会男女平等的官方原则广为传播, 但父权主义文化并没有消失, 而是隐

藏在了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背后。这些研究一再表明,现实与国家所承诺的男女平等的目标相去甚远,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

有的研究也尝试着探求男女性别差异背后的原因。其中一个论点是,女性的低收入是由于她们自己的偏好和选择(Sørensen & Trappe, 1995)。其逻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女性并不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自愿参与劳动的。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策略所导致的低工资制度,使得女性不得不工作以维持家庭的消费水平(Parish & Busse, 2000)。而且,女性集中在照护和服务行业,在管理和行政等职业只占极小的比例(Putnam, 1990; Parish & Busse, 2000; Bian et al., 2000; 李实、马欣欣, 2006),女性在非国有企业的比例也较高(Bian et al., 2000),而女性集中的行业的工资较之其他行业更低(Putnam, 1990)。然而,性别上的职业隔离仅仅能解释一小部分性别收入差异。一些研究结果还表明,控制职业或是职业中的女性职工比例,性别收入差异仅仅降低很小的百分比。即使是在同一职业内,相似特征的男女收入依然存在较大的差异(Putnam, 1990; Parish & Busse, 2000)。

(三) 评论

以往的研究描述了一个普遍而又简便的性别差异情形,并没有指出整体上的性别分层结构。而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是,一方面国家强力提倡性别平等,并且拥有再分配的权力和权威,如可以通过设定劳动力价格,消除工资上的性别差异;另一方面性别收入差异又是如此不可忽视地存在着。是国家的政策和措施没有取得实践中的效果?还是国家的再分配权力对父权主义无能为力?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比起其他社会中的女性,享受了更多的平等和机会。

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现象是,这些社会中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有一定比例的“标杆”似的女性被提拔到高层行政领导岗位;而在普通民众层次,不同教育水平、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女性,所对应的性别收入差异是不同的(Xie & Hannum, 1996; Putnam 1990; Bian et al., 2000; Parish & Busse, 2000)。这些碎片似的信息,说明国家平等主义政策对于不同群体的女性的效果是不相同的,不同群体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有程度之别。性别分层的结构比简单说女性收入比男性低 25%,要复杂得多。

而这一特别的性别分层结构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一些研究

将性别收入差异归结于社会主义国家权威的功能丧失 (Sorenson & Trappe, 1995)。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因为, 平等主义国家的确没有能够确保性别间的平等。但是, 这样的论断又是不彻底的, 它没有指明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安排, 并不是国家没有推行平等主义政策, 而更有可能的是基层的官僚政治使得国家的平等主义无法普及到普通民众的层次。这意味着国家的平等主义原则与这一原则的执行间存在着制度性的断裂。而这一断裂发生在再分配的链条中。

三、断裂的再分配过程理论

(一) 社会主义分层结构的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最大范围的社会平等。事实上, 在社会主义实践中,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达成这一目标。比如, 社会主义的劳动力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由于整个工资体系的制定建立在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压制消费的基础之上, 因此, 其本身就是一个低工资的体系。同时, 由于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意识形态, 各个等级间的工资差异细微。这样的社会分配制度也就达到了高水平的社会平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 城镇基尼系数(Gini index)低于0.30。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 这是惊人的成就, 他们甚至用“去阶层化”来描绘当时的分层结构(Parish, 1984)。一定程度上讲, 再分配过程在这一时期的确显示出了其强大的均平功能。

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依赖于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 以再分配的原则和方式逐级加以实现。在其实施过程中, 官僚体系不仅可能自身从中获利, 同时下层官僚政治对待普通民众也可能并不一视同仁, 从而导致整体上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结构。

从以往的文献研究当中, 至少可以归纳出三类基层官僚政治区别对待普通民众, 并影响到了所有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机会, 造成了他们在收入上的差异。这就是再分配理论所没有涉及的再分配制度下区隔主义的官僚行为。首先, 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组织是单位制度(李路路、王奋宇, 1992; 李汉林, 2004; Lin & Bian, 1991), 而单位是有级别的。根据行政级别的逻辑, 离再分配权力核心越近的单位, 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Walder, 1992)。其次, 社会主义的基本所有制是公有制,

但所有权事实上是由单位领导来行使的(Djilas, 1957), 因此, 对于官员能够占据甚至囤积超出标准的住房(Szelényi, 1978; Tolley, 1991)我们也就不会吃惊了。同时, 他们在分配给普通民众资源的时候, 也有任意行事的可能和能力。第三, 在基层单位内部, 再分配机制滋生出主从—庇护关系(Walder, 1986)。单位领导需要自己可以信任的人员来收集信息并动员、实施自己制定的措施。为了吸引这些下级, 领导不得不分配给他们相较于普通民众更多的资源(工资、福利甚至病假等等)作为激励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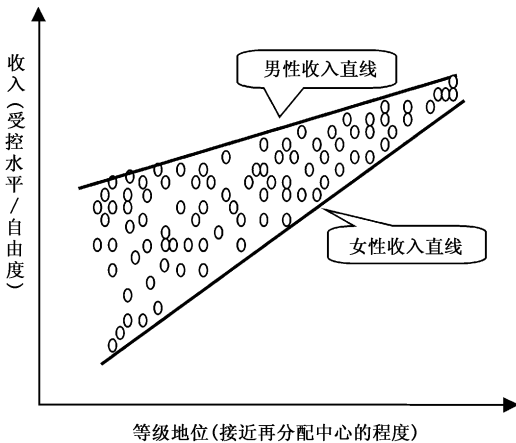


图 1 再分配中收入分配(离异状态)与等级地位关系的理论模型

因此, 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中的收入结构有两个特征: 一是整体上较小的差异; 二是根据距离再分配中心的远近不同而不同的变动范围。在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 收入较低。同时, 正是由于较大的收入变动范围, 使得基层官僚政治行为的任意性有了用武之地(图 1)。这一“向右上收敛”的结构背后的制度性原因是平等主义原则与官僚政治行为之间的矛盾。其中的关键是任意的官僚行为扭曲了平等的再分配过程。这一任意的官僚行为在再分配中心周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但在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 它得以流行。

(二) 性别不平等的结构

与这样的工资结构相对应, 性别不平等的结构也显现出来。图 1

显示,男性与女性的收入直线均随等级地位的上升而增加,女性的增长趋势要快些(谢宇等在1996年就指出过教育与收入差异间的趋势,参见Xie & Hamnum, 1996)。在右上再分配中心的周围,由于较强的体制内的监管,官僚行为任意性较低,男女性别收入差距较小;而在左下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体制内的监管较弱,官僚行为任意性较高,男女性别收入差距较大。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的女性群体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一方面,接近再分配中心的女性享受着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保护,免受性别歧视的迫害;另一方面,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女性则难以得到国家的保护,遭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与延续的父权主义都对再分配过程施加了影响。但是,它们分别影响着不同阶层的女性。

尽管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参与劳动,并将性别平等当成基本原则。但是,其推广平等主义的努力仅仅是在它能够抑制的地方起到了作用;在它无法顾及的地方,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性别歧视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生成的,并由此构建了一个特征鲜明的性别分层结构: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越远,受到的性别歧视就越严重。在这一结构中,受害最重的是底层的女性——她们得到了微薄的再分配经济报酬,同时也承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

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再分配机制的调节能力逐渐淡化。一方面,国家继续掌控着某些领域;另一方面,对于完全由市场控制的领域,则放弃了监控的权力。这样就形成了不同领域内不同女性群体的进一步分化。继续置于国家监控领域的女性群体承受的性别不平等保持着原有的特征;而置于国家之外的市场中的女性,则面临着新的环境——原来得益于平等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则失去了国家的保护。毫无疑问,这些女性必然将承受以往未曾经历的性别不平等。

(三)可验证的假设

为了进一步用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下面给出一系列可供检验的假设及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性别歧视结构背后的两个相互矛盾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平等主义的推广及监控与基层官僚行为的任意性。而断裂的再分配过程理论中能够概括这两个矛盾的力量对比的,则是相对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因此,可供检验的假设需要首先指

明表示这一距离的指标。我们认为,工作单位所有制形式、教育、职业以及管理职位的高低都是可以表示这一距离的指标。同时,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变化,即再分配机制逐渐减弱,市场调节能力的逐渐增强也考虑在内。因为这些变化降低了平等主义国家通过再分配过程推广和监控的能力。本小节将给出描述在转型时期性别分层结构的过渡特征的假设。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根据各经济组织的行政级别下达计划的,计划中包括行政设定的工资等级。在下达与反馈(亦即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经济组织的级别和所有制形式直接影响了单位相对于再分配中心的能力(李路路、王奋宇,1992;Walder,1992;李汉林,2004)。因此,单位的级别和所有制直接表示了其相对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级别越高,离再分配中心越近;国有单位离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较非国有单位更近。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a: 单位的级别越高,女性受到的平等主义保护越多,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越小;反之,单位的级别越低,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越严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越大。

假设 1b: 国有单位的女性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较小;与国有单位女性相比,非国有单位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更严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大。

在社会主义转型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国有单位逐渐脱离再分配过程,进入市场调节。在这些单位中,没有了原有的推行平等主义原则及监管的机制。因而,这些单位的管理人员有了更多的自由任意行事。相反,国有单位仍然置于国家直接管理与监控之下,国家的平等主义原则依然行之有效。因此,

假设 1c: 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国有单位逐渐显示出与国有单位不同的性别分层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对职工的控制也随着其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是因为教育水平是职业、干部身份以及工作单位级别的重要指标。首先,教育水平与职业地位间的相关联系相当高。教育程度高的更容易进入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职业(Walder et al., 2000; 陆学艺主编, 2004)。同时,国家从高中或技校招收技术工人,而从初中或以下招收非技术工人;其次,由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国家特意从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员当中,招收干部(Walder, 1995; Walder et al., 2000)。而大学毕业生自动

地获得了干部的身份;再次,高教育程度的更容易进入级别较高的工作单位。这是因为软预算限制下社会主义单位贮藏人才资源的逻辑(科尔内,1986/1980)。由于级别较高的单位更接近再分配中心,它们有能力获得更多的高教育水平的职工,而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也愿意加入这样的单位,因为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简言之,教育水平是一个恰当的代表相对于再分配中心距离的指标——教育水平越高的,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近。随着改革的深入,虽然在国有单位依然有上述模式,但整体而言,教育与职业、干部身份以及单位级别的相关关系越来越弱。这是因为,市场对于教育的回报符合生产率的增长曲线,高教育水平在市场上更容易得到欣赏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工资。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 2a: 教育程度越高,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近,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小;相应地,教育程度越低,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远,低教育水平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更严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大。

假设 2b: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单位中,教育程度对于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没有变化;在非国有单位中,女性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于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没有影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随着教育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职业与管理职位是社会主义再分配过程影响个人经济境况的另外两个维度。不同的职业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并不相等。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政府将个人分配到职业岗位上。一般而言,计划经济中,改变职业的可能性较低。^①在城市工作人员中,有干部与工人的划分(李强,2000)。干部与工人的人事管理由不同政府部门实施——前者由专门的人事部门管理,而后者则可以下放到工业单位领导来管理。干部的身份更高,其工资等级也更高。通常,干部的工资等级严格按照国家设定的等级分配;而工人的工资则更有可能由单位内部的政治过程来决定。同样地,管理职位越高,受到再分配中心的监控更严格;而低层管理人员或是非管理人员则受到基层官僚政治行为的影响更大。在所有职业类型中,单位的管理人员与官员显然是离再分配中心距离最近的干部;而服务业、产业工人都是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工人。随着市场调节的份额越来越大,非国有单位的职工脱离了国家再分配体系。他们

^① 其实改变工作单位的可能性也很低。

的收入基本上取决于单位领导的评估(或多或少基于工作效率,但两者并非完全相同)。因此,这为非国有单位的基层性别政治行为提供了不受国家平等主义限制的可能。与此相反,国有单位原来的基本分配机制已经有所改变,但单位领导的政治行为依然受到国家平等主义原则的限制。因此,国有单位的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模式没有变化,而非国有单位则产生了新的模式。因此,

假设 3a: 职业地位越高,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近,高职业地位的女性受到平等主义保护更多,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小;相应地,职业地位越低,距离再分配中心就越远,低职业地位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更严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更大。

假设 3b: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单位中,职业地位对于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没有变化;在非国有单位中,女性职业地位的高低对于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没有影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随着职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假设 3c: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单位中,管理职位对于男女性别收入差异的影响模式没有变化;在非国有单位中,女性管理职位的高低对于她们受到的性别歧视没有影响,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随着管理职位的变化而变化。

四、数据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本文将分析跨度为 15 年的 3 个已经公开的全国性数据。获得这些数据的调查均是在全国多个城市抽取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它们是 1988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1988 CHIP)(Griffin & Zhao, 1992)、1995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1995 CHIP)(Riskin et al., 2000)以及 200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 CGSS)(李路路, 2007)。前两者是模版基本相同的相隔 7 年的研究,而后者是首次全国范围内按照 GSS 模式的调查。有关这三次调查的具体信息详见各自的文件。

由于本文使用职工收入来关注性别收入差异。因此,进入分析的数据是上述 3 个调查数据中的一部分。对于前两个数据,本文仅使用了城镇部分。同时,为了排除没有工作的以及已经退休的,分析数据限定于 18—60 岁的城镇人口;2003 CGSS 本身就是关于城镇居民的调查,

我们限定 18—60 岁的受访者进入我们的分析。由于本文分析的基本统计模型为线性回归模型, 缺损数据的删除使用通栏的方式 (list-wise)。最终, 本文分析数据的具体样本数为: 1988 CHIP—17197 人(其中女 8211, 男 8986); 1995 CHIP—11389 人(其中女 5395, 男 5995); 2003 CGSS—4125 人(其中女 2029, 男 2096)。

(一) 变量定义

因变量。个人在调查时的年收入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变量。它不仅包括工资收入, 而是包括工资、奖金、福利及其他收入在内的总收入。在前两个调查中, 收入是按照不同的来源逐项填写的, 我们将所有这些相加得出总收入; 后一个调查直接在问卷中说明, 调查的是包括所有来源的总收入。按照惯例, 我们对收入变量取对数值, 以便使其更接近于正态分布。

自变量。用于本文分析中的自变量大体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一是常用的收入模型中个人层次的变量; 二是女性与其中一些变量的交互变量。第一类变量中包括: 女性(女为 1, 男为 0)、党员(党员为 1, 非党员为 0)、年龄(连续变量)、年龄的平方除以 100、^① 教育年限(连续变量)、单位所有制(国有为 1, 非国有——包括私营、合资、集体等——为 0)、职业(1988 CHIP 与 1995 CHIP; 分为 5 个类别), 以及管理人员(2003 CGSS; 分为非管理人员、低层管理人员与中高层管理人员)。由于这 3 个调查中的问题选择项的措词并不完全相同, 在生成同一变量时, 我们只好将不同调查中的变量统一到可辨别的大类中。如, 两次 CHIP 调查的职业分类不完全相同。最后, 统一到了可供辨别的共同的 5 大类职业中。所有制变量也一样, 统一到了国有与非国有的分类中。第二类变量包括: 女性与年龄、教育年限、单位所有制、职业, 以及管理人员生成交互变量。这些变量正是用来表示, 男女两性的收入是否根据这些变量的变化而变化。

具体的变量描述性统计量, 见表 1。

^① 除以 100 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模型中回归系数的易读性。

表 1 描述性统计量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u>1988 CHIP</u>					
收入 (logged)	17197	7.45	.44	4.09	10.31
女性	17197	.48	.50	0	1
党员	17197	.24	.43	0	1
年龄	17197	37.09	10.14	18	60
年龄 ² /100	17197	14.79	7.71	3.24	36
女性 * 年龄	17197	16.93	18.82	0	60
女性 * 年龄 ² /100	17197	6.41	8.11	0	36
教育年限	17197	10.43	2.81	0	16
女性 × 教育年限	17197	4.81	5.38	0	16
自我择业	17197	.01	.08	0	1
产业工人	17197	.53	.50	0	1
职员	17197	.24	.43	0	1
技术人员	17197	.16	.37	0	1
经理/管理人员	17197	.07	.25	0	1
女性 * 自我择业	17197	.002	.05	0	1
女性 * 职员	17197	.10	.30	0	1
女性 * 技术人员	17197	.08	.27	0	1
女性 * 经理/管理人员	17197	.01	.10	0	1
国有	17197	.79	.41	0	1
女性 * 国有	17197	.34	.47	0	1
<u>1995 CHIP</u>					
收入 (logged)	11389	8.54	.64	0	10.96
女性	11389	.47	.50	0	1
党员	11389	.26	.44	0	1
年龄	11389	38.66	9.54	18	60
年龄 ² /100	11389	15.86	7.44	3.24	36
教育年限	11389	10.83	2.92	0	24
女性 * 教育年限	11389	4.96	5.58	0	24
自我择业	11389	.01	.09	0	1

续表 1

	N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工人	11389	.44	.50	0	1
职员	11389	.21	.41	0	1
技术人员	11389	.23	.42	0	1
经理/管理人员	11389	.12	.32	0	1
女性 * 自我择业	11389	.003	.06	0	1
女性 * 职员	11389	.11	.31	0	1
女性 * 技术人员	11389	.12	.32	0	1
女性 * 经理/管理人员	11389	.03	.16	0	1
国有	11389	.82	.39	0	1
<u>2003 CGSS</u>					
收入(logged)	4125	8.06	2.86	0	12.61
女性	4125	.49	.50	0	1
党员	4125	.27	.67	0	4
年龄	4125	41.19	10.17	18	60
年龄 ² /100	4125	17.18	8.17	2.89	34.81
教育年限	4125	10.73	2.98	0	19
女性 * 教育年限	4125	5.20	5.69	0	19
非管理人员	4125	.71	.45	0	1
低层管理人员	4125	.18	.38	0	1
中高层管理人员	4125	.10	.30	0	1
女性 * 低层管理人员	4125	.09	.28	0	1
女性 * 中高层管理人员	4125	.03	.17	0	1
国有	4125	.63	.48	0	1

(二) 模型

本文使用常见的收入线性回归模型: $Y = XB + e$

其中, Y 是 $n \times 1$ 的因变量向量 (n 为数据中的个案数), 这里是年收入的^{对数形式}—— $\log(\text{年收入})$; X 是一个第 1 列为向量 1 的 $n \times (p + 1)$ 矩阵, 第二列到第 p 列为模型中 p 个自变量的数据 (不同的模型 p 可变); B 是长度为 $(p + 1)$ 的回归系数向量, 其第一项为截距项; e 为 $n \times 1$ 的残差项向量。

在使用上述统计分析模型时, 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首先, 为了显示不同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并不是所有的模型均包含相同的自变量。

教育与职业(管理职位)的相关性过高,因此它们并不同时进入模型中(特别是不同时包括与女性的交互变量)。其次,如前面所述,随着转型过程的推进,女性男性的收入差距根据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的不同将显出不同的特征。反映到数据中,则是不同所有制下的回归模型可能并不相同。这提出一个警示,我们不能轻易地将两个所有制下的数据做一个混合的回归分析。一个有效而简便的方法是使用 Chow—检验来判断是否可以将不同所有制的数据混合起来得出一个总的回归模型。下面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忧虑。对 1988 CHIP 的国有与非国有数据的 Chow—检验,显示了相同的回归特征。因此,我们使用了同一个回归模型。相反地,1995 CHIP 与 2003 CGSS 数据则没有通过 Chow—检验。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两个数据时,分别对国有与非国有数据作回归分析,得到两个相互独立的模型。

(三) 分析结果

表 2 给出了 1988 年、1995 年以及 2003 年分变量组别的男女年收入比较。这些描述性结果可以大致显示出两性收入的差距大小及趋势。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男女收入的性别差距。至少可以从该表中归纳出以下两点。首先,从绝对收入上看,1988—1995 年与 1995—2003 年这两个 7、8 年的间隔中,城市居民的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①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男女收入的上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 1988—1995 年间,男女收入均增加约 3 倍。因此,男女性别收入差距也增加了约 3 倍。但是,在 1995—2003 年间,男性收入的增加远远高于女性收入的增加——女性收入增加约 45%,男性收入增加约 78%,而男女收入的性别差距保持了 3 倍以上的增长。因此,在这一时期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增长远远高于男女两性各自的收入增长速度。换言之,在社会转型的推进过程中,女性至少在收入上没有享受到与男性同步的增长。

其次,除去少数几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绝大多数分组别的男女收入的性别差距显示出了以下特征:随年龄的增加而扩大、随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随职业地位的提高而降低、随单位级别的提高而降低、非国有单位较国有单位差距更大。这些特征在这 3 个调查数据中是一致的。这些描述性的结果大体上也与前面的理论假设(1a、1b、2a, 以及

^① 当然,这里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才是实际收入增长。

表 2 分组别男女性别年收入及差异(1988, 1995, 2003; 单位: 元)

	1988 CHIP		1995 CHIP		2003 CGSS				
	女	男	男-女	女	男-女	男	女	男-女	
总体	1720	2041	322	5488	6571	1083	7957	11683	3726
年龄									
30 以下	1352	1431	79	4357	4732	374	8455	11350	2895
31 - 40	1834	2060	226	5604	6379	775	7481	12468	4988
41 - 50	1941	2344	403	6091	7227	1137	8282	11026	2744
51 - 60	1971	2440	469	5886	7830	1945	7702	11694	3991
教育									
小学及以下	1638	2194	556	4298	5734	1436	3558	7834	4277
初中	1679	1966	287	4838	6090	1252	5447	9757	4310
高中	1737	1961	225	5577	6352	776	8367	10721	2354
大学	1993	2278	284	6813	7447	634	16729	17851	1122
职业									
自我择业	1772	2143	371	4932	7103	2171	7206	9876	2670
(非管理者)									

续表 2

	1988 CHIP			1995 CHIP			2003 CGSS		
	女	男	男-女	女	男	男-女	女	男	男-女
产业工人	1601	1845	244	4661	5776	1115	11826	14034	2208
职员	1844	2101	257	5654	6351	696	21468	19271	- 2.197 (中高层管理者)
技术人员	1972	2263	292	6609	7305	696	—	—	—
经理或管理人员	2089	2446	358	7489	7836	347	—	—	—
单位所有权									
非国有	1488	1828	340	4501	5728	1227	7973	12834	4861
国有	1812	2080	268	5797	6715	918	9426	11690	2263
私营或其他企业	1683	2554	871	6510	8299	1789	—	—	—
集体企业	1486	1806	321	4228	5211	983	—	—	—
地方国有	1755	2010	255	5527	6434	907	—	—	—
中央国有	1874	2144	271	6421	7213	792	—	—	—
N (人)	8211	8986	17197	5394	5995	11389	2029	2096	4125

注：CGSS2003 数据分析中，没有使用“职业”分类，而使用了“职位”分类。

3a)基本一致。接下来,我们用回归模型更严格地来检验这些假设。

表3给出的是根据1988CHIP数据的关于个人收入决定因素的5个回归模型。其中,前3个模型使用了整个样本数据;而后两个模型将国有与非国有样本拆开,分别计算了含有相同回归变量的两个独立回归模型。模型2a与2b的拆分是为了验证,是否可以将这两个群体的子样本放到一起做回归分析。前面提到过,1988CHIP中的国有与非国有通过了Chow一检验。从模型2a与2b的比较中也可以粗略地印证这一结论。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不仅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它们的数值大小也极为接近。惟一例外的是自我择业的回归系数差异较大。这是因为,在1988年,这一职业的个案数较少。因而,国有与非国有数据中的这一回归系数相当不稳定。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个模型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两个子样本混在一起,得出整体样本的模型。在理论上,这一结果对应的结论是,至少到1988年为止,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中个人收入的决定模式没有区别。

表3中的模型1a—1c是针对1988CHIP整体样本的模型。其中,模型1a是基本模型;而模型1b在1a的基础上加入了女性与年龄变量、女性与教育程度、女性与单位所有制的交互变量;模型1c是在1a的基础上剔除了教育程度变量,加入了职业二分变量群、女性与年龄变量、女性与单位所有制的交互变量,及女性与一系列职业二分变量的交互变量。这样,相对于模型1b与1c而言,模型1a是一个嵌于它们之内的简单模型。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关于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否随着某些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分析策略就是要显示,女性与这些变量的交互变量是否显著地不等于0。如果这些交互变量的数值大于0,则表明随着这些变量的增大,女性相对于同等条件男性(提醒:男性编码在这里为0),获得了额外的更多的收入。这样的收入缩小了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的差距。因此,整个分析过程中(包括表4的分析)的关注点就是这些交互变量。

模型1a中的结果显示:1988年城镇个人收入随着年龄、^①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工作在国有单位的党员的收入更高;在控制以上变量后,女性相对于男性收入要少约 $10\%(1 - e^{-0.101})$ 。模型1b中新加入的

① 年龄 $2/100$ 的系数为负,显示年龄的收入增长曲线随着年龄的增长渐趋平缓——即增长越来越缓慢。

表 3 个人年收入的决定因素(1988 CHIP)

	1988 CHIP 整个样本数据			国有单位	非国有单位
	(1a)	(1b)	(1c)	(2a)	(2b)
女性(vs. 男性)	-. 101*** (17.07)	-. 408*** (5.40)	-. 222** (3.08)	-. 273*** (3.23)	-. 397* (2.27)
党员(vs. 非党员)	. 058*** (7.76)	. 056*** (7.53)	. 054*** (6.70)	. 040*** (4.94)	. 093*** (3.38)
年龄					
年龄	. 078*** (41.14)	. 080*** (31.74)	. 080*** (31.37)	. 078*** (29.25)	. 088*** (12.45)
年龄 ² /100	-. 079*** (31.72)	-. 079*** (24.49)	-. 080*** (24.59)	-. 077*** (22.78)	-. 092*** (9.62)
女性 * 年龄		. 011** (2.79)	. 009* (2.35)	. 009 [†] (1.94)	. 013 (1.35)
女性 * 年龄 ² /100		-. 023*** (4.29)	-. 023*** (4.23)	-. 018** (3.01)	-. 029* (2.17)
教育					
教育年限	. 017*** (16.29)	. 010*** (7.03)		. 006*** (4.05)	. 011* (2.23)
女性 * 教育年限		. 015*** (7.25)		. 012*** (5.41)	. 016** (2.80)
单位所有制					
国有单位(vs. 非国有)	. 114*** (15.88)	. 058*** (5.21)	. 063*** (5.68)		
女性 * 国有单位		. 087*** (6.03)	. 092*** (6.37)		
职业(vs. 产业工人)					
自我择业			. 030 (.67)	. 074* (2.02)	-. 256* (2.45)
职员			. 013 (1.31)	. 006 (.77)	. 077*** (3.70)

续表 3

	1988 CHIP 整个样本数据			国有单位	非国有单位
	(1a)	(1b)	(1c)	(2a)	(2b)
技术人员			.064 *** (5.35)	.040 *** (3.95)	.098 ** (3.04)
经理/管理人员			.067 *** (4.53)	.045 ** (3.21)	.168 *** (3.70)
女性 * 自我择业			.010 (.14)		
女性 * 职员			.059 *** (4.14)		
女性 * 技术人员			.067 *** (4.00)		
女性 * 经理/管理人员			.071 * (2.15)		
常数项	5.484 *** (148.79)	5.527 *** (111.59)	5.634 *** (118.53)	5.656 *** (105.53)	5.390 *** (41.23)
N	17197	17197	17197	13542	3655
R ²	.31	.32	.31	.30	.26

注: 括号内为 t-检验统计量的绝对值。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交互变量在统计意义上都具有显著性, 表明模型 1b 相对于 1a 有显著提高。女性与年龄的两个交互变量的显著性, 表示高年龄女性的收入增长相对于男性急剧减缓——即, 高年龄段女性与同年龄段男性的收入差距最大。我们更关注的女性与教育程度以及女性与单位所有制的交互变量也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以及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女性, 相对于同等条件的男性得到了额外的收入——或是这些女性缩小了她们的收入与男性的差距。具体的回归数值显示, 平均而言, 女性每增加 1 年的教育年限, 其收入相对于男性增加 1.5% ($e^{0.015} - 1$); 在国有单位工作的女性, 其与男性的收入差距降低 9.1% ($e^{0.087} - 1$)。模型 1c 中的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模型 1b 中的相差无几, 不再讨论。与模型 1b 比较, 模型 1c 新加入了职业变量以及女性与

表 4 个人年收入的决定因素(1995 CHIP, 2003 CGSS)

	1995 CHIP		2003 CGSS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女性(vs.男性)	-.358*** (7.81)	-.292* (2.67)	-.191*** (10.38)	-.283*** (7.49)	-1.740*** (4.48)	-1.906*** (3.34)	-.774*** (6.39)	-1.479*** (8.25)
党员(vs.非党员)	.120*** (8.69)	.158*** (3.41)	.118*** (8.02)	.127** (2.62)	.229** (2.68)	.259* (2.56)	.322*** (3.62)	.208* (2.03)
年龄	.103*** (23.18)	.096*** (8.92)	.089*** (21.04)	.090*** (8.32)	-.104** (2.58)	-.040 (.77)	-.125** (3.05)	-.048 (.90)
年龄 ² /100	-.103*** (19.01)	-.112*** (7.81)	-.095*** (17.52)	-.112*** (7.72)	.169*** (3.48)	.059 (.86)	.162** (3.25)	.048 (.70)
教育								
教育年限	.027*** (10.22)	.048*** (5.69)			.184*** (7.68)	.124** (2.89)		
女性 * 教育年限	.023*** (5.79)	.006 (.53)			.096** (2.86)	.061 (1.11)		

续表 4

	1995 CHIP		2003 CGSS			
	(1a)	(1b)	(2a)	(2b)	(3a)	(4a)
职业(vs. 产业工人)						(4b)
自我择业			.094 (1.08)	.123 (.54)		
职员			.038 [†] (1.77)	.136* (2.03)		
技术人员			.186*** (9.02)	.238*** (3.45)		
经理/管理人员			.161*** (6.78)	.260** (3.18)		
女性 * 自我择业			-.043 (.32)	-.215 (.63)		
女性 * 职员			.118*** (3.89)	.101 (1.20)		
女性 * 技术人员			.136*** (4.66)	.099 (1.06)		

续表 4

	1995 CHIP				2003 CGSS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女性 * 经理/管理人员			.113** (2.69)	.138 (1.08)				
管理职位(vs. 非管理人员)							.462* (2.56)	.542† (1.67)
低层管理人员							.647** (3.23)	.808* (2.13)
中高层管理人员							.477† (1.81)	.499 (1.14)
女性 * 低层管理人员							.783* (2.03)	1.054† (1.82)
女性 * 中高层管理人员								
常数项	6.011*** (69.08)	6.056*** (28.11)	6.558*** (81.78)	6.679*** (34.45)	7.800*** (8.76)	7.739*** (6.90)	10.724*** (12.44)	9.293*** (9.06)
N	9286	2103	9286	2103	2609	1516	2609	1516
R ²	.19	.12	.18	.11	.09	.07	.06	.07

注:括号内为 t-检验统计量的绝对值。†: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职业变量的交互变量。相对于产业工人而言,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收入要分别高出 $6.6\%(e^{0.064}-1)$ 和 $6.9\%(e^{0.067}-1)$ 。而职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女性,其收入相对于男性的差距分别降低了 $6.1\%(e^{0.059}-1)$ 、 $6.9\%(e^{0.067}-1)$ 和 $7.4\%(e^{0.071}-1)$ 。以上的这些结果,证实了假设 2a 和 3a。同时,没有任何结果支持假设 1c。或许,这是因为 1988 年的城市改革还处于刚刚开始阶段。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我们引入对 1995 CHIP 和 2003 CGSS 数据的分析。

表 4 给出了 1995 年和 2003 年城镇居民个人年收入的 8 个模型。这些模型分成回归自变量完全相同的两两对应的 4 组:前两组是对 1995 CHIP 数据的分析;后两组是对 2003 CGSS 数据的分析。这 4 组模型中,第一个模型包含国有单位的个人,而第二个模型包含非国有单位的个人。这是因为,这两个数据中的国有与非国有的样本显示出了不一样的回归特征,同时都没有通过 Chow 一检验。通过比较这些两两对应的模型,我们也可以具体地指出,在所有制不同的单位,男女收入的性别差异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比较表 3 与表 4,1988 年的数据可以将国有与非国有的样本混合在一起做回归分析,而 1995 年与 2003 年的数据则不能做同样的混合模型,只能将国有与非国有样本分开分析。显然,1995 年和 2003 年国有单位与非国有单位的个人收入决定因素——特别是性别收入的差异,显出了不同的特征(假设 1c)。

比较模型 1a 与 1b、以及模型 3a 与 3b,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 1995 年和 2003 年数据中的国有单位样本的回归模型中,女性与教育程度的交互变量统计上显著大于 0,而非国有单位样本的回归模型中的同一变量则没有显出显著性(假设 1c)。在国有单位样本中,女性每增加 1 年的教育年限,1995 年数据显示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增加 $2.3\%(e^{0.023}-1)$,2003 年数据则显示这一数字为 $10.1\%(e^{0.096}-1)$ 。随着教育的增加,国有单位的女性获得了额外的收入以降低她们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假设 2a);但非国有单位的女性没有这样的额外收入,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于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没有影响(假设 2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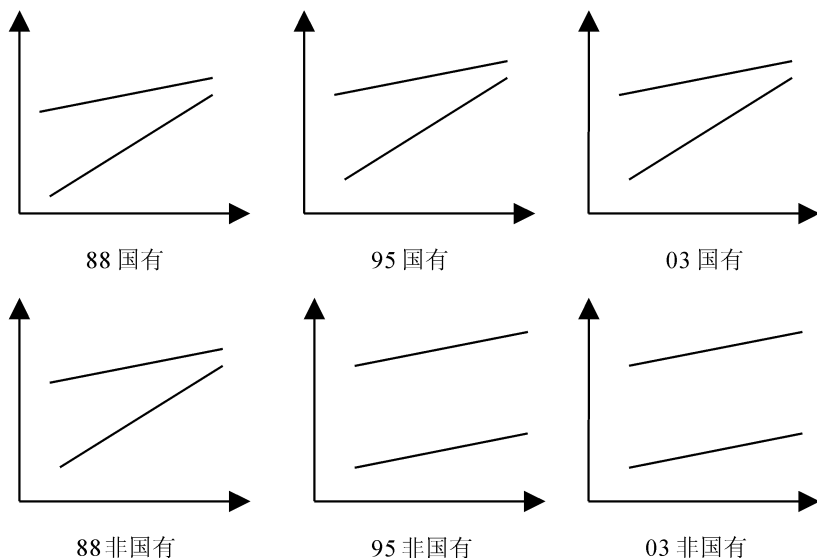
模型 2a 和 2b 分析了 1995 CHIP,剔除了模型 1a 和 1b 中的教育变量,加进了职业变量。可以发现,在国有单位样本中,高职业地位获得了更多的收入;而高职业地位的女性则获得了额外的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再次提醒,男性编码为 0),并降低了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假设 3b)。在非国有单位样本中,高职业地位获得了更多的收入;高职业地位的女

性并没有得到任何照顾,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没有任何改变(假设 3b)。模型 4a 和 4b 分析了 2003 CGSS,剔除了模型 3a 和 3b 中的教育变量,加进了管理职位变量。同样地,我们可以发现,与非管理人员相比,国有样本与非国有样本中的低层和中高层管理人员均获得了更高的收入(非国有样本中的低层管理人员系数接近显著)。但管理人员与女性的交互变量中,国有样本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系数显示了显著性,表示这些女性得到了额外的收入并降低了与男性收入间的差距(假设 3b);而非国有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显著性,表示不论管理职位高低,女性与男性收入的差距没有变化(假设 3c)。

(四)小结

在所有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女性变量的系数为统计上显著小于 0 的负数。这表明确实有一个女性性别收入的扣除因子——即,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收入低于男性。但是,我们更关注这一性别收入差距随其他变量变化的结构。同时,对跨度为 15 年的 3 个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审视不同的所有制单位组织内对于性别因素的处理。对于改革之初时的 1988 年数据,我们没有发现国有与非国有单位个人收入决定因素上的差异,因此使用了同一个模型来分析整个样本数据。对于 1995 年与 2003 年数据,我们分开分析国有单位样本与非国有单位样本。

男女性别收入差距的结构可以用图 2 来表示。图中的纵轴表示收入,横轴表示教育、职业、职位地位。图中的男性收入直线在上,女性收入直线在下,表示男性收入较女性更多;另外,随着地位的提高,男性与女性收入都增加。上面 3 个图是国有单位的模式,下面 3 个图是非国有单位的模式。在国有单位中,没有发现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在地位较低的左端,男性收入远高于女性,收入的性别差距较大。随着地位的提高,女性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男性更快。这是因为在国有单位,高地位的女性相较于同条件的男性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因而减少了与男性间的收入差距。在高地位的情况下,女性的收入已经极为接近男性的收入。在非国有单位中,我们发现了变化。1988 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男女性别收入的比较模式与国有单位的相同。但 1995 年与 2003 年数据的分析显示,随着地位的提高,女性原来获得的额外收入消失了。高地位的女性并没有缩小与男性间的收入差距。



纵轴：收入；横轴：教育/职业（位）地位；
所有图形中，男性直线在上，女性直线在下

图 2 收入与地位相互关系模式(分国有与非国有单位)

五、讨 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社会主义性别分层结构模型, 并演示了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演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性别分层是由于官僚体系扭曲了再分配过程, 在平等主义国家无法监控的基层产生。并指出随着相对于再分配中心距离越远, 等级地位越低, 女性受到性别歧视的可能性就更高。随着改革的深入, 市场机制调节能力的扩张, 受到再分配体系保护的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受到的性别歧视也逐渐加重。平等主义的国家极力推行男女性别平等, 而与父权主义纠缠在一起的官僚政治行为却倒向区隔主义的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结构并不是简单的男女间各种指标的差距, 而是一个更为复杂划分的结构——不同的女性群体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性别不平等。

(一)其他可能的理论

本文提出的解释有可能遇到一些理论上的挑战,比如:强调男女两性体能差异、脑力趋同的理论。从本质上讲,这一理论可以被归结于人力资源理论的范畴,只不过它强调了生产过程中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源类型,认为等级地位的高低与工作中使用体能和脑力的比重是紧密联系的。等级地位低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体能,处于劣势的女性的收入自然比男性少很多;而等级地位高的工作,需要的是更多的脑力劳动,体能的优劣没有太大的影响,女性收入与男性较为接近。

初看起来,这一理论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强调的是生产能力意义上男女人力资源的差异,并排除了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深具保守主义的色彩。但是,这一模型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是不相符合的。理由有三。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女性化职业更多地集中在服务业、办公室职员以及技术人员。^①相对而言,这些职业并非整个职业等级的低端,其从业者也可以归入脑力劳动阶层。然而在这些职业中,女性的收入与男性相比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其次,这一模型无法解释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高等级地位的女性失去了额外的补偿,她们与男性收入的差距并不因为她们高等级的地位而缩小。按照人力资源的观点,高等级地位女性的额外补偿是与她们所拥有的脑力型人力资源相对应的。这一资源是这些女性所固有的,并不会随着社会主义的转型而消失,也不会因为在国有单位或非国有单位工作而消失,它将继续(原来的再分配单位,现在的市场)发挥效应。然而事实上,在新的时期,在非国有单位工作的女性拉大了与男性间的收入差距。脑力型的人力资源并没有任何保护作用;最后,跨社会的比较更能够说明这一模型的不合理性。按说男女性别在这些人力资源上的差异是跨越社会制度背景的,这一理论也应当适合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分层结构。然而,资本主义美国性别分层的结构正好与这一模型的预测相反:等级地位(教育程度或是职业地位等)较低的女性与男性收入的性别差距较小,而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与男性收入的性别差距则更大(Morgan, 1998; Grodsky & Pager, 2001)。^②

① 这里指的技术人员更多的是医生、护士、教师等专业人员,而非工程技术人员。

② 一个重要的例子是“玻璃天花板”的比喻:一定地位的女性很难进一步上升,因为她们遭受了并不明显(透明的玻璃)的制度上的局限(天花板的限制)。这一比喻在种族分层中也同样适用。

(二) 国家与性别分层

社会主义国家性别分层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分层结构正好相反的事实,值得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平等主义政策理论上应涵盖整个社会。但是,由于再分配制度自上而下、逐级推进的特征,使得在国家政权监管不到的基层,区隔主义的官僚行为可以扭曲再分配的过程。因此,它更多的是保护了处于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而对处于再分配过程边缘的基层女性影响甚微。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推行平等主义的道义和政策。但是,现代福利国家通常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的福利政策。这样的政策为处于底层的女性提供了帮助,使她们可以依靠国家资源继续生存。文化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有着穿透制度的能量。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男女性别的平等。或许,仅仅只有制度设置上的变迁并不足以彻底消除性别歧视。

以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分析,都提到国家对于女性不同起因、不同程度的保护。国家视角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国家的福利政策取代了男性的家庭责任,使得女性更加依赖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Haney, 2000)。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相近的地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保障了底层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彻底地进入家庭的多个领域(Whyte, 2003),使得妇女在生活与工作上有更大的依赖。从这个角度讲,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女性的保护显然要彻底得多。对于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而言,国家机器更多地显示了父权主义的特征;女性受到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并通过福利政策、法律条文以及刑罚规定来实现这样的父权社会的运行(Haney, 2000)。这样的论断与我们上述对社会主义国家性别分层结构的分析结论完全相反。之所以有这两种相反的结论,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性别平等主义政策。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性别社会分层不能归结于政府的不作为(比较 Sørensen & Trappe, 1995)。国家一直都在实践性别平等的理想。但是,国家的监控能力在再分配制度安排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这样的局限性给了基层官僚扭曲再分配过程的机会。事实上,在保护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实现了自己男女平等的诺言。

(三) 转型时期的演变

随着再分配机制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市场调节

机制的逐步增强,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性别分层结构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前面已经提到过,尽管其意识形态的原则强调男女平等,但这一承诺更多的是在等级地位较高的地方得到了保证,而在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基层,性别不平等一直都存在并且突出。这一国家的保护或是监管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逐渐减弱,这导致等级地位较低的女性受歧视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而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则开始承受以前在再分配制度中不曾经历的性别不平等。从我们的数据结果看,在远离国家监控的市场机制中,女性受到了更多的歧视。可以预期,从再分配体制内跳入市场体制的女性精英或许可以得到相对于从前更高的收入,但是她们也必然要承受与同等条件男性相比的更大的收入差距,以及更少的晋升机会。总体而言,再分配制度的淡出,使得父权主义的性别歧视失去了平等主义国家的抑制。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型时期的性别不平等显然比再分配时期严重。与再分配相比,市场调节有着其优势。但是,它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没有自然内在的保护和支持。随着市场调节的强化,是否意味着,在转型时期的性别不平等最终将出现与资本主义社会性别不平等趋同的特征?

六、结 语

社会分层研究对于性别的重视,既有理论的因素,也有方法论上的因素。更为根本的,它同样含有理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之初就有男女平等的诺言,实际中男女性别不平等弥漫整个社会。可见平等主义的理想与不平等的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性别不平等存在于再分配过程中,是父权主义借助区隔主义的官僚政治,扭曲再分配过程而形成的。平等主义的国家尽力推行男女平等的原则,但是却无法规范远离再分配中心的官僚行为。这样的性别不平等结构显示了鲜明特征:根据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不同的女性群体承受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越是远离再分配中心,越是承受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本文使用跨度长达15年的3个调查数据,验证了由这一理论推导出的相应的假设。

对于再分配制度下的性别不平等的清楚认识有助于我们预期在社会转型时期性别不平等的走向。随着再分配机制作用的逐渐降低,平

等主义国家对于女性的保护进一步减弱。以往远离再分配中心的等级地位较低的女性依然处于整个劳动力的末端; 而以往受到国家完全保护等级地位较高的女性, 如今也受到无情的性别歧视。正是由于国家力量的退出, 导致了转型时期性别歧视的抬头和加重。

本文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模型, 并使用了大规模数据做了验证。未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至少可以有以下两个方向: 一是进一步挖掘在再分配机制下以及在再分配机制淡化的转型时期, 性别不平等的微观动力体系。或许, 这样的工作不能坐在计算机前完成, 更需要走近实际生活(参见 Lee, 1998; 李静君, 2006); 二是密切关注性别不平等在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的情况和特征。到现在为止, 社会主义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现在就断言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与西方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相似的特征, 还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 卡尔·波兰尼, 2007/2001/1944, 《大转型》, 冯刚、刘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亚诺什·科尔内著, 1986/1980《短缺经济学》, 张晓光、李振宁、黄卫平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 李汉林, 2004, 《中国单位社会》,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静君, 2006, 《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 李友梅等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路路, 2007,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文件]》, 中国人民大学版本, <http://www.chinacgss.org>
- 李路路、王奋宇, 199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强, 2000, 《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 厦门: 鹭江出版社。
- 李实、马欣欣, 2006, 《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陆学艺主编, 2004,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G. 伦斯基, 2005/2001, 《老问题与新视角: “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分层理论的相关性》, D. Grusky 编《社会分层》, 王俊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宋时歌, 2004, 《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 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编《中国社会分层》,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谢嗣胜、姚先国, 2005, 《我国城市就业人员性别工资歧视的估计》, 《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张丹丹, 2004, 《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Bian, Y. 2002,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 Bian, Y. & J.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

- Bian, Y., J. Logan & X. Shu 2000, "Wages and Job Inequalities in the Working Lives of Men and Women in Tianjin." in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eds.) by Entwisle & G. Henderson. 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jilas, M. 1957, *The New Class*. New York: Praeger.
- Einhorn, B. 1993, *Cinderella Goes to Market: Citizenship, Gender, and Women's Movements in East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Verso.
- Griffin, Keith & Zhao Renwei 1992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1988] computer file]. New York NY: Hunter College Academic Computing Services [producer].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utor] 1993. <http://www.icpsr.umich.edu>
- Grodsky, Eric & Devah Pager 2001, "The Structure of Disadvantage: Individual and Occupational Determinants of the Black-White Wage Ga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4).
- Haney, L. 2000, "Feminist State Theory: Applications to Jurisprudence, Criminolog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 Hong, E. 2000, "Iron Girls Revisited: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Work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in *Re-Drawing Boundaries: Work, Households, and Gender in China*, (eds.) by B. Entwisle & G. Henderson. 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C. K.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n, N. & Bian, Y. 1991, "Getting ahead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3).
- Morgan L. A. 1998, "Glass-Ceiling Effect or Cohort Effec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Gender Earnings Gap for Engineers, 1982 to 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4).
- Nee, V.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
- 1991,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Between Redistribution and Market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3).
- Parish, W. 1984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J. Wast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sh, W. L. & S. Busse 2000 "Gender and Work." in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eds.) by W. Tang & W. L. Paris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rish, W. L. & J. Farrer 2000 "Gender and Family." in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eds.) by W. Tang & W. L. Paris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utman, G. W. 1990,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under Socialism: Earnings Attainment and Earnings Decomposition in Yugoslavi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1(1).
- Riskin, Carl, Zhao Renwei & Li Shi 2000,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1995 [Computer file]. ICPSR version.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 [producer],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utor], 2000. <http://www.icpsr.umich.edu>

- Sorenson A. & H. Trappe 1995 "The Persist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Earnings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3).
- Stacey, J.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zeleñyi, Ivan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 Tang W. & W. L. Parish 2000,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Cambridge Modern China Series. 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olley, G. 1994, "Urban Housing Reform in China: An Economic Analysi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No. 123.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2002,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 Walder, A.G.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2, "Property Rights and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4).
-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1996,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 Walder A., B. Li & D.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2).
- Whyte, M.K. & W. L. Parish 1984,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yte M. K. 2003, *China's Revolutions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v. 96.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Xie, Y. & E.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Urba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
- Zhou, X. 2000,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王天夫)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赖扬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李博柏)

责任编辑: 谭 深

PAPER

Democracy and Social Reform: Tocqueville on social problems
 *Chong Ming* 1

Abstract: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veloped his social theory through his reflections on social problems. By the analysis of his writings on pauperism and prison reform,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how Tocqueville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i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that he established between social problems and industry and democracy. In his efforts to resolve the social problems by the social reform based on democracy, Tocqueville revealed in his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reform his moralist concern, which was to construct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bond.

Gender Income Gap under Redistribution and Its Evolution: 1995—2003
 *Wang Tianfu, Lai Yang'en & Li Bobai* 23

Abstract This paper poses a new theoretical model on gender stratification in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The origin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in state socialist societies is that patriarchy, with the help of bureaucratic system, twists the redistributive process and gives rise to gender inequality in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The structure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indicates the more distant from the redistribution center, the mo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higher-status women who were protected in the redistributive process before are facing increas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now. This paper uses thre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sets with a time span of 15 years to test a series of derived hypotheses.

An Assessment of Citizenship *Yang Yiyin* 54

Abstract: The citizen is the foundation of civil society. Therefore, the measurement of citizenship will help to interpre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to classify them, so as to forecast their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track of their changes. But who counts as citizen in China? What are the key 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s or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tizen? The goal of the current